

绪 论

在陈独秀的一生中，他先后崇拜过中外历史上许多的大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叔本华、尼采等，在他从事共产主义活动后，他最崇拜的人是列宁。这不仅因为列宁知识渊博，在共产国际有崇高的地位和威信，还在于他的对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关注；此外，列宁深邃的辩证思维以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看法，深得陈独秀的赞同。在列宁去世后，陈独秀一连写了四篇专题文章纪念他，这在陈独秀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陈独秀去过苏联，见过第三国际的所有领袖，但他在文章中只表达了对列宁的崇敬：“列宁的外表，像一个很朴素的教授，又像一个很活泼的工人；他的内心储藏了对于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同情的热泪。”^①列宁的思想在陈独秀的后期文章中仍然占有非常大的分量，这是

因为在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纠葛在一起并被开除党籍的时候，他唯一可资引用的辩护依据，就是列宁的著作。在南京监狱中，陈独秀仍然在研究列宁的《组织论》，说明他对于自己的被开除出党，仍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说，列宁是陈独秀崇拜时间最长的人。另一方面，陈独秀认为列宁看到了党内民主可能出现的问题，但列宁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去解决这一问题。由于列宁这一“失误”等，晚年，陈独秀放弃了对列宁的完全信仰，提出了重新认识包括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领袖的价值的价值的问题。但由于陈独秀去世过早，他没有来得及将他的“重新认识”留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晚年醉心于进行《小学识字教本》的同源词的研究，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遗憾。

与列宁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与陈独秀矛盾最深的联共（布）政治局书记斯大林。在大革命后期，斯大林多次指示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动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陈独秀无法保证在国共合作不破裂的前提下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而与斯大林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大革命失败后，新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拒绝陈独秀出席八七会议，成为陈独秀拒绝去莫斯科面对斯大林的重要原因。在了解到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争论，特别是被开除党籍后，陈独秀对斯大林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自己的做法极度不满，这在他后期文章中有大量反映。另一方面，陈独秀只承认自己是“左派反对派”，将自己与斯大林的矛盾性质和与国民党的矛盾性质区别开来，在被捕后的审判中，他不赞同章士钊的关于托派与国民党成“犄角之势以清共”的辩护词。^④但陈独秀与斯大林的矛盾不是绝对的，共产国际希望陈独秀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并通知陈独秀到莫斯科为开除自己的党籍事进行辩

护等，表明斯大林并不希望与陈独秀个人的关系僵化。陈独秀出狱后，改变了倔强的脾气，希望回延安工作，如果不是王明极左地理解斯大林의思想和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矛盾，拒绝陈独秀回延安，陈独秀与斯大林的关系或许可以改写。陈独秀于 1940 年 11 月 28 日写《我的根本意见》15 条 第 7 条也明确说“不能一切归罪于斯大林”^⑧，表明晚年的陈独秀超脱了对斯大林个人的成见，至少放弃了集矢斯大林一人的做法。

在共产国际领导人中，陈独秀对联共（布）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布哈林的意见仅次于斯大林。一则是因为在马林和陈独秀关于是否加入国民党的争论中，布哈林支持了马林，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政治决议案；二则在蒋介石有了叛变的迹象，陈独秀提出退出国民党的提案后，布哈林在《真理报》上点名批评陈独秀彭述之之提案三则在中共六大上，布哈林在分析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强调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方针没有错，大革命失败是因为陈独秀等犯了机会主义错误、缺少必要的政治手腕^⑨。在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也多次批评了布哈林，认为他犯了机会主义错误，过于相信国民党^⑩。此外 陈独秀认为 斯大林和布哈林为掩饰共产国际政策的失败，不承认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形势处于低潮，是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内盲动主义的国际根源^⑪。客观地说，布哈林对中国革命有贡献，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和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见 1926 年 12 月 1 日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大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⑫）。由于布哈林和斯大林一起反对了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支持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陈独秀批评布哈林往往与指责斯大林在一起。布哈林 1928 年

因与李可夫结成右倾集团而被撤职，从这个意义上说，布哈林和陈独秀有类似之处，都是路线斗争的牺牲品。

季诺维也夫是共产国际主席，因和托洛茨基结成政治联盟而被撤除职务。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对季诺维也夫采取了和对布哈林态度一样的批判立场，与对托洛茨基的态度完全不同，原因之一，是陈独秀认为季诺维也夫在与斯大林、布哈林的斗争中，采取了妥协的立场，因此他提出了“要反对季诺维也夫等的妥协态度，不怕所谓‘跌出党的范围’”^⑧的观点。陈独秀 1929 年反对季诺维也夫，还因为他当时不清楚蒋介石在三二〇事件（即“中山舰事件”）后季诺维也夫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与当时的陈独秀的观点一致；陈独秀反对季诺维也夫的一个历史原因，是因为季诺维也夫曾和斯大林、布哈林一起反对过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等。但陈独秀反对苏联 1936 年将季诺维也夫以谋杀罪处死，曾在南京监狱里说：苏联这样不民主，还算什么工人国家^⑨。表达了陈独秀对季诺维也夫最后结局的同情的一面。这和对布哈林的态度有区别。布哈林 1938 年以叛国罪被执行死刑，陈独秀则无表示。

在共产国际代表中，先后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主任、主任的维经斯基（又译“魏金斯基”）和陈独秀是唯一交往最久、友谊最深的一个。维经斯基帮助陈独秀发起了中国共产党，并在陈独秀与马林的矛盾中站在陈独秀一边，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策略，并强调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在陈独秀和鲍罗廷的矛盾中，维经斯基也经常站在陈独秀一边，批评鲍罗廷的一些倾向国民党的做法；此外，维经斯基为争取共产国际从经济上援助共产党做了许多工作。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也有很深的个人友谊，如推荐陈独秀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

际四大，并经常督促陈独秀给他写信，陈独秀也往往通过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转达自己的意见。即便在大革命后期，维经斯基在中共五大上仍然支持了陈独秀，希望罗易在批评共产党领导人的同时，讲讲共产党的成绩，对陈独秀在五大上继续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大革命失败、陈独秀和托洛茨基纠葛在一起后，维经斯基批判了陈独秀的托洛茨基立场，但他对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错误的批评，和其他共产国际代表的批评有明显的区别，可以看到他和陈独秀之间过去的默契的合作和友谊的痕迹。在陈独秀的文章和书信中以及和朋友的谈话中，陈独秀从来没有批评过维经斯基，这也是在共产国际代表中唯一的。

在陈独秀的政治生涯中，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人物。因为马林提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和陈独秀在西湖会议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共产国际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后，陈独秀最终不得不服从国际的“命令”，接受了加入国民党的主张。这个方针的正确性问题，后来成为陈独秀与斯大林、布哈林矛盾的焦点，也成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的重要话题。但马林在处理与陈独秀的个人关系上，因批评张国焘的小组织行为，在陈独秀被捕后，参与营救他，并积极主张援助共产党等，改善了他们的紧张关系。特别是在中共三大时期，马林由于改组国民党的困难，改变了从前对国民党的完全肯定的看法，批评了国民党的封建主义和武力统一中国等缺点，与陈独秀达到了政治上的一致。但马林的迅速离开中国，中断了共产国际代表关于国民党性质的批评性的看法，对陈独秀是一个遗憾。马林和陈独秀的结局有不少相似之处，如马林离开中国后，与斯大林闹了矛盾，与共产国际决裂，并

与托洛茨基有过交往；此外，他们去世的时间也非常接近，1942年4月15日，马林被纳粹枪杀，一个月后，陈独秀因病去世。

苏联派驻国民党的首席顾问鲍罗廷由于执行共产国际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方针和不倾向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势力，与陈独秀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鲍罗廷在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很多事情不与陈独秀和共产党商量，在经费援助方面也完全忽视共产党的需要。鲍罗廷反对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争取领导权，1924年就提出“共产党员不应该在各种委员会中谋求职位”^⑨。他甚至反对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过激”而影响国民党的“右派”，在1925年2月14日就提出“如果共产党员在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内使右派感到厌烦，我们准备召回他们”^⑩。作为反击，陈独秀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做出决议批评鲍罗廷：“中共中央执委会非常不满的是鲍罗廷同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同党的执委会联系很少，也不同它讨论决议和对国民党的态度的改变而是单独行事。”^⑪三二〇事变后，鲍罗廷主张“共产党员要退出黄埔军校”，并支持了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此外，在孙中山北上、北伐、蒋介石叛变后武汉政府的发展方向等问题上，陈独秀和鲍罗廷的意见都不一致。只是在“大革命”后期不能执行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问题上，他们总的意见一致，但具体方法也有矛盾。毛泽东认为，“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的责任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⑫鲍罗廷回国后，曾因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而遭到批判，他的基本观点是：“陈独秀主义是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的混合物。所以，在很大的程度上，陈独秀主义要对我们过去所蒙受的失败负责”；我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中

国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我，也犯过严重的错误……我的错误之一就在于，我与陈独秀之间虽发生过意见分歧，甚至是极其严重的分歧，但没有把这些分歧引向公开的斗争……”^⑩但他的观点遭到反驳，被认为是回避自己的问题。

印度人罗易是大革命失败前夕被派到中国出席中共五大的第三位代表，他的使命之一是在维经斯基失去信任之后，来华督促中国共产党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由于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一系列指示在统一战线内部执行十分困难，罗易和陈独秀、鲍罗廷形成了尖锐的冲突。罗易不断地向共产国际反映陈独秀的错误，极力主张调离陈独秀去苏联，批评陈独秀“与其说是共产党人，不如说是国民党人”^⑪，同时，在中共五大上有意识地发起了对陈独秀等的错误的讨论，并提出了增加中央委员会成员以冲淡陈独秀等老中央领导的办法。但在维经斯基提出讲一讲共产党的成绩后，罗易谈了共产党的成绩，并认为中共五大十分成功，“国内不会有什么孟什维主义”^⑫。这个观点后来遭到瞿秋白的批判。另一方面罗易又是一个不成熟的革命家，他在革命的关头，将共产国际的紧急指示给汪精卫看，为汪精卫叛变革命提供了口实，加重了革命的危机。由于罗易的泄密，他被提前召回苏联，结束了在华的不到半年的使命。就在陈独秀被开除党籍的同一年，罗易也因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被开除出共产国际^⑬。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殊途同归了。

在共产国际领袖中，陈独秀只肯定两个人，除了列宁，另一个人就是联共（布）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在陈独秀后半生的政治生涯中，托洛茨基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陈独秀参与了托洛茨基派的小组

织活动，被开除党籍；也由于陈独秀参加了反对派的活动，是蒋介石后来没有杀他的原因之一；陈独秀后来不能回延安，并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汉奸，无不与托洛茨基有关系，这个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对陈独秀的评价。陈独秀对托洛茨基的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尤其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的观点十分赞同，并赞成他的“不断革命论”。同情托洛茨基被苏联驱逐后的命运；托洛茨基曾激烈地批评过陈独秀，在得知陈独秀写《告全党同志书》的内容后，与陈独秀建立了很深的个人友谊，在中国托派小组织中，给了陈独秀最高的地位，并关心陈独秀出狱后的安全，建议他到墨西哥等。另一方面，陈独秀不完全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特别是在对中国托派失去信心后，晚年基本超脱了托派的立场，并明确在书信中提出要重新认识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布尔什维克领袖的价值。^⑬

注：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 2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30 页。

强重华、杨淑娟、王树棣、李学文：《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86 页。

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12 页。

⑭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运动（1926—1927）》下第 6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98 页、第 436～438 页、第 431 页。

⑤⑥⑧⑩ 《陈独秀著作选》第 3 卷，第 112 页、第 116 页、第 102 页、第 367 页。

⑦⑮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运动（1926—1927）》下第 4 卷 第 19 页、第 289 页。

⑨⑬ 朱洪：《从领袖到平民——陈独秀沉浮录》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312 页、第 279 页。

⑩⑪⑫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运动（1920—1925）》第 1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年版第 443 页、第 576 页、第 534 页。

⑰ 叶永烈：《毛泽东之初》，作家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16 页。

一 陈独秀与列宁

在共产国际领导人中，列宁是陈独秀长时间的信奉者，他曾用列宁的思想，为自己在大革命中的责任进行辩护，以反对当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他的指责；即便在与托洛茨基的思想认同后，他高举的仍然是列宁主义旗帜，如称自己的小组织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而不称为“托洛茨基派”。大革命失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列宁的思想成了陈独秀的精神支柱。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后仍在牢中读列宁著作《组织论》等。只是到晚年，陈独秀才在个别场合表示对包括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领袖的价值的怀疑。探讨陈独秀对列宁的信仰、认识到怀疑的过程，是探讨陈独秀后期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

确立信仰

1、转向列宁主义

早年的陈独秀是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在他 1919 年被捕出狱后逐步接受马列主义前，他的思想成分庞杂不一。一方面，陈独秀不反对在其主编的《新青年》上宣传马列主义，如 1919 年 5 月 15 日李大钊将《新青年》6 卷 5 号办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公开把运动引向社会主义。鲁迅在同期《新青年》上发表《“来了”》和《“圣武”》杂谈，赞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另一方面，陈独秀也不反对胡适在《新青年》上宣传杜威的实用主义，将《新青年》办成宣传杜威实用主义的专号。

五四运动是陈独秀转向李大钊“主义派”的转折点。1919 年 12 月 1 日，陈独秀出狱后出版中断了半年的《新青年》第一次提到列宁：“俄国的 Lenin 一派的 Bolsheviki 的由来，乃是从前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瑞典都城 Stockholm 开秘密会议的时候，因为要不要和 Bourgeoisie（工商社会）谋妥协的问题，党中分为两派，Lenin 一班人不主张妥协的人占了多数，因此叫做 Bolsheviki，英文叫做 Major group（多数派），乃是对于少数派（英文叫做 Lesser group）Mensheviki 的名称，并非是什么过激不过激的意思。日本人硬叫 Bolsheviki 做过激派，和各国的政府资本家痛恨他，都是说他扰乱世界和平。”^①在这篇短文里，陈独秀明确地反对将列宁一派的布尔什维克党称为“过激党”，标志着在李大钊与胡适“问题与主义”的论

战中，陈独秀最终站到了“主义”一边。后来，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称：“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 Soviet Russia 的汉译本。”^{91②}

2、宣传列宁

1920 年夏天，陈独秀在上海组织共产党小组，在他的领导下，上海的许多进步刊物广泛宣传了列宁。10月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刘江（费奥多罗夫）向俄共阿穆尔州委会汇报说：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活动中心，300 多种期刊都有社会主义色彩，“出版的书籍和杂志刊登有苏俄人士，特别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照片，购买踊跃”^{92③}。与此同时，列宁的名字开始出现在陈独秀的文章和信件中。如 1920 年 9 月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时举例说：“俄罗斯若以克鲁巴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制复兴也必不免。”^{93④}又如 1921 年 7 月 1 日陈独秀在《新青年》9 卷 3 号发表《随感录·卑之无甚高论》，在对中国经济和教育落后感叹时，陈独秀在引用了吴稚晖“现在只好令列宁杀了我们，然后我们再杀列宁”的话后感叹道：“我想吴先生这种卑之无甚高论的论调，不专为老腐败而发，也并为一般自命为觉悟的青年而发。”^{94⑤}

3、与列宁的一次交往

晚年的列宁对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成立十分关注。1921 年夏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被派到中国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列宁写了亲笔介绍信，表示了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十分关心。1922 年 1 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

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接见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张国焘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询问了他们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问题的意见。1922年11月13日，陈独秀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听到了列宁的演讲。由于身体不好，列宁没有接见各国代表。这是陈独秀唯一的一次见到列宁，他后来多次回忆了这次大会和列宁给他的印象：“列宁的外表，像一个很朴素的教授，又像一个很活泼的工人；他的内心储藏了对于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同情的热泪，他不但同情于被压迫的工人农民阶级，指导全世界的阶级争斗，他并且同情于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指导全世界的民族争斗。”^⑥1930年4月13日陈独秀写《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一文还提到：“列宁在世时所领导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中，法国党内因为有接近此种秘密会党的倾向，曾受了严重的批评……”^⑦

信仰的原因

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在列宁去世后的一年多里，陈独秀连续写了三篇文章悼念列宁，加上1927年1月写的《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中之中国革命运动》一文，陈独秀写了四篇专题文章悼念列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列宁的“正确而伟大”、列宁对殖民地民族运动和中国民众的同情。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多次引用列宁的观点，为自己的各种观点寻求理论依据和权威支持，这些观点也同时反映了陈独秀崇敬、信仰列宁的种种原因。

1、列宁的见解“正确而伟大”

为纪念列宁逝世一周年，1925 年 1 月 21 日，陈独秀写了《列宁与中国——列宁逝世周年纪念日记告中国民众》。他将列宁和释迦牟尼进行了比较：“释迦佛说：要普度此世界众生于他世界；列宁说：要为此世界人类中被压迫者脱离被压迫地位于此世界而奋斗。我们要指正释迦佛所说他世界在何处及超度了多少众生到那里，便未免太滑稽了；而由列宁奋斗所解放之被压迫的工人农民阶级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已经分明在此世界中令我们看见了……”^⑧这个思想成分肯定了列宁的历史地位，也纠正了他 5 年前写《答张崧年》中附和罗素关于“列宁等行事有些宗教性”的含糊观点。——在《十月革命与东方》一文中，陈独秀还将列宁的思想和威尔逊的观点作了比较，以强调“列宁的见解正确而伟大”^⑨。

1925 年 4 月，陈独秀写《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比较列宁在民族问题上和改良派的区别：“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殖民地及被压迫的国家（即半殖民地）他们的民族运动，只有依照列宁这样伟大的周到的意见而行，才能够彻底的解决，才能够得着真正的自由，这是一件最明白无疑的事。”^⑩强调了列宁的见解的“伟大、周到”。

2、列宁“提倡被压迫的民族去自决”

1925 年 1 月 7 日，陈独秀发表《我们对于造谣中伤者之答辩》，反驳一些人造谣陈独秀等共产党人收了苏俄的钱，鼓吹苏俄外交时说：“苏俄对华外交，是遵守列宁‘对于被压迫的民族只与不取’的政策，他们拿种种权利有特权挟一个空洞的

承认，实用不着我们为了帮助鼓吹……”^⑪为反驳国家主义派 陈独秀于 1926 年 5 月发表《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是不是国家主义》一文 引用孙中山的话宣传了列宁：“世界列强所以诋毁列宁的原因，是因为他说世界多数的民族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为少数的民族二万万五千万人所压迫。列宁不但说出这种话，并且还提倡被压迫的民族去自决，为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打不平。列强之所以攻击列宁，是要消灭人类的先知先觉，为他们自己求安全……”^⑫

在《列宁与中国——列宁逝世周年纪念告中国民众》一文中，陈独秀高度赞扬了列宁对中国重大事件的关注，如引用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中国的战争》文章 谴责帝国主义借义和团革命发动侵犯中国的战争；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充分肯定中国辛亥革命和谴责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文章等，以此反驳国内反动势力将列宁丑化成“极恶穷凶的怪物”的攻击。陈独秀写道：“在列宁这些话中 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何等的人物，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及中国民众之同情是何等诚挚。”^⑬

1927 年 1 月，陈独秀写《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中之中国革命运动》，这是陈独秀纪念列宁的第四篇专题文章，也是他写纪念列宁的最后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介绍了列宁 14 年前写的《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一文。他写道：“列宁若到现在还活着，眼见法西斯的组织遍于欧洲各国，而且在好几个国家取得了政权……列宁不但更要自信‘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这句话是对的，而且要喊出‘黑暗的欧洲与革命的中国了’。”^⑭这段话写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前夕，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异常激烈，所以陈独秀有“革命的中国”这样的感

慨。

3、引用列宁思想，总结历史经验

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前后，多次用列宁的思想分析大革命失败等问题。他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幼稚，因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列宁主义的国际指导之下，尚未曾做出很大的错误。”^⑩“后一时期即史大林继列宁而执政时期的情形就不同了，它的主要的特征，就是二元政权的势力增涨……”^⑪陈独秀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是由于共产国际犯了“混合组织”的错误：“列宁常常引用巴尔夫斯的话说：‘我们无论何时都不应忘记的条件是，共同奋斗，分别走路 不混合组织 看同盟者犹如看敌人一样。’”^⑫“列宁则坚持只能和社会革命党有政治上的联盟，而不能在组织上和它混合。”^⑬此外，针对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等的援助，陈独秀指责说：“国际以苏联无产阶级血汗造成的巨量金钱和武器，帮助中国的资产阶级（蒋介石、冯玉祥等）力量的发展……分明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领导民族民主革命一直到社会革命之无产阶级的战略，而是机会主义。”^⑭

陈独秀还根据列宁的观点，为自己的反对派活动辩护。他引用列宁的观点“我们的机关报上，并不一般排斥同志的争论……既然有不同的见解，而缺乏公然的争论，把关于真实问题之不同的意见搁置起来是现代运动的缺陷之一。”^⑮1929年10月10日陈独秀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说：“列宁曾说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要有正确的政治领导为先决条件方会实现……”^⑯在《告全党同志书》中陈独秀说：“列宁在联共第十次大会上曾经说过：‘党内有了根本不同的政治意见，

而又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小组织才是正当的。’他当年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的运动，就建筑在这个理论之上的。👍

价值与方法

1. 坚持唯物史观 反对机械唯物论

1924年1月26日陈独秀写了《列宁之死》一文辩证地分析了列宁的死与俄罗斯革命的关系：一方面，“唯心派素来把历史变动之唯一原动力归到个人意志之伟大，因此将俄罗斯革命事业，无论功罪是非，都当作列宁个人的事业……他们不明白个人的主观意志无论如何伟大，决不能创造客观上绝对不可能的东西”。另一方面：“个人的意志固然不能创造客观上不可能的东西，而在客观上可能的范围以内，却有个人意志回旋的余地，并且必须有此个人的努力及天才的创见……我们决不可陷于机械的唯物之误解，说列宁生死存殃和俄罗斯革命事业绝无影响。”👍这段话反映了陈独秀评价列宁个人在历史上地位和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既反对了个人决定历史的历史唯心论，表达了革命不会因列宁的去世而停止不前和坚定革命信念的思想；也反对了否定个人反作用于历史的机械唯物论的观点，对列宁的去世给俄罗斯革命和共产国际运动带来的损失表示了惋惜。

陈独秀关于列宁的历史作用的观点，是他的成熟的哲学思想的一部分，不是偶尔的观点。这年5月25日他写《答张君劢及梁任公》引用了《列宁之死》一文以阐述唯物史观和机械唯物论的区别：“历史的唯物论者以为人是物质造成的，